

编外“辞海人”谈《辞海》

本报记者 黄春宇

《辞海》史上的每一版编修，都是一次集体性的知识生产与思想碰撞。在统一、标准的辞书体例下，个性化也许不再是必需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独立思考。近日，《文匯學人》约访了京沪两地的四位学者，听这些编外“辞海人”谈《辞海》。

要想编一本合格的词典，就需要编纂者既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文字水平，还要懂得辞书学理论

周明鉴（中国辞书学会顾问，原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我1952年进入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毕业后分在煤炭工业部。1974年调到北京煤矿机械厂“七二一工人大学”任教。1978年进入科学出版社。先做了九年图书编辑，1987年调词典室后在辞书学基本理论方面补了课。但不久就调任副总编辑，负责抓全社图书质量。作为调研，我决定全部新版书的三校样都审读一百页。由于涉及的学科内容从基础科学的“数理化天地生”到工程技术，以及某些社会科学，这就“逼”着我广泛补充各学科的知识。这一学习过程为我后来进入的辞书编纂工作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基础。

1993年，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评委会开会期间，我有幸与时任《辞海》编委会常务副主编巢峰老共事。1995年第二届评委会时，他盛情邀请我作为特约编审参加《辞海》（1999年版）的修订。一个既难得又光荣的任务，我当然欣然从命。1997年1月，我住进了陕西北路的上海辞书出版社，这一住便是两年。每天傍晚，其他人下班回家了，我一个人接着工作，经常会熬到凌晨。以前在科学出版社时，我跟自己约法三章——当天送到我桌上的校样，一定要全部看完，次日早晨送回总编室，当天事一定当天完。习惯一旦养成，就很难改掉了。《辞海》的科技词条大约有六七万



周明鉴，参与《辞海》（1999年版）的审读。

条，工作量非常大，我不分昼夜地审读，尽力提出一些修改意见。那段时间，无论编纂还是审读，都有这样的默契，即“一切资料都要核对，一切书证都要复核，一切数据都要核实”。

上海辞书出版社对修订工作是全力以赴的。全社几十位在职编辑以及还能工作的退休编辑都参与了工作，还从社外聘请了26位特约编审，一起来完成这项宏伟的工程。

首先是一起分学科审读编者提供的修订稿，发现问题或存疑时就把意见写在纸条（行话叫“浮签”）上，贴在原文旁。第一轮审读结束，大约有六千多张浮签，交由编辑和编者处理。排版后以组成审读组的形式审读二校样，每个审读组都由四人组成：语文一位、科技一位、社科两位，但审读时不限专业，要求全看。这样做的好处是语文专家在科技条和社科条中发现了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社科专家在语文条和科技条中发现了社科方面的问题，而科技专家也在语文条和社科条中发现了科技方面的问题。这次通读下来，发现的问题大约有两万多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分学科审读时只能发现本学科中的问题。而在全部学科统一编排，放在一起审读时，

不同学科词条之间的重复、矛盾、缺漏、不平衡等问题就显露出来了。随后又通读三校样，提出的意见大约还有五六千条。巢峰老的要求非常严格：通读时必须做到政治性内容无差错，学术性内容尽量反映最新进展并符合规范及各项国家标准，收词及释文符合《辞海》凡例的要求，文字上做到“多一字则长、少一字则短”。全书通读了三遍，并校对了十一遍，反复交叉进行，力求将存在的问题消灭得比较彻底。例如，《辞海》（1989年版）里有一个词条叫“泻湖”（注：英文是lagoon，意思是被沙坝或珊瑚礁分割而与大海分离因而盐度较高的水域），而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97年改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988年公布的《地理学名词》上，正确的写法应该是“潟湖”。所以，“1999年版”就改正了。

说起来，我只有幸参与过“1999年版”的审读工作。由于年过七旬，就未再参加“2009年版”的修订工作。

《辞海》的传统是10年修订一次，这也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首先，任何一本辞典都只能反映一定历史阶段人们的认识，无论语言文字，还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各

个学科都是不断发展的，这就使得辞典的内容永远会落后于实际，需要适时更新；其次，就像“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一样，辞典因其涉及面广、参与人数众多且水平经验并不一致，虽然在严格的编纂体例下力求形成一个完整、严密、准确的系统，但总还会留下少量瑕疵，也是一项“遗憾的工程”。只有不断修订才能逐渐完善；第三，辞书出版后还要经受读者的检验。编纂者和出版者要随时根据读者的反馈来核查词典在收词、释义、编排、检索、插图、附录等方面是否符合读者的需要，不断推出新版本以满足读者不断深化的要求。以《辞海》（1999年版）为例，修订的内容主要包括：增收了6000多个与新形势、新成果有关的词条，比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理论”、“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因特网”；删去了6000多个查检率低或已经陈旧的词条，以保证全书篇幅不致膨胀；对保留的内容进行了广泛的修改，按照最新的国家标准以及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复核了全书的量、单位和科技名词（如：“概率”条去掉了“亦称‘或然率’、‘几率’”，“岩溶亦称‘喀斯特’”改为“喀斯特亦称‘岩溶’”等）。按照《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等权威资料复核了全书生物的拉丁学名，并增加了动植物保护方面的国家法规知识。而对外文、地名、人名、年份、插图等所作的专项检查也都发现了数以千计的问题，确保了全书的质量。

“词典工作大有可为，夸大一点说，是不朽的事业。”吕叔湘先生这番话，我深有体会。编辞典是整个国家文化建设事业的基础性工程，正因如此，辞典编纂是绝对不能含糊的，这也是《辞海》历来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的原因。编辞典的工作很严格，当年吕先生为了编好《现代汉语词典》，给所有参与的人准备了一份包含了多达180条的《编写细则》。写得极为深入细致。例如对于避免用未知概念去解释词目而出现不封闭的毛病，吕先生就规定了三种处理法（首选方案是把未知概念换成别的词，换不了就把它也作为词目收录进来，如该词很少出现没有必要收录，则可在该词的后面加一个括注，说明其含义）。

要想编一本合格的词典，就需要编纂者既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文字水平，还要懂得辞书学理论。当年开始编《现代汉语词典》时，其中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百科词是请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专家编写的，这些专家的学术水平当然毫无问题，但写完以后发现无法使用。因为都写得太专，一般读者会看不懂。所以后来就在词典室专门成立了科技组，对科技词条进行“语文化”，就是改得通俗一些，使中等水平的读者能看懂。但如果只是由学中文的人来编写百科词（包括科技词和社科词），则情况会更糟。我从评奖和质检工作中接触到的大量语文词典发现，其中的百科词条几乎都是差错高发区。问题就在于编者的专业知识有缺陷，按照国家标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一级学科有42个，二级学科有445个；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有20个，二级学科有249个。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只在大学中文系毕业，或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也只是具有一定的中文功底，但是缺乏浩如烟海的百科知识，不可能为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最新的、准确的知识。《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的质量之所以较好，是因为编者和出版者都

（下转9版）➔

➔（上接7版）

版本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对于这个平台的潜力，各方面都寄予了很高的期待。按照辞书社的设想，《辞海》网络版将实现词条的实时更新，

“比方说今天出现了一个热点，我们就找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来编写词条，然后在线提交给编辑审核，通过以后立即发布，响应速度与生产周期近似于新闻媒体。”既然是随时随地可查、实时动态更新的网络版《辞

海》，用户的参与和反馈也很重要。一方面，需要他们提供及时而有效的纠错信息；另一方面，《辞海》网络版会考虑开放一些词条的编纂权限，采用与否，取决于后台编辑与专家的审核结果。

“《辞海》走过的每一步都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人们所能达到的认知水平。文明是怎么发展的，知识是怎么进步的，人类的历程可以从《辞海》的版本更替中找到清晰的线索。”接受采访的几位辞书

人不约而同地对前几代辞海人表示了敬意，“既然把这么重要的历史遗产交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就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把《辞海》的品牌和‘辞海精神’传承下去”。（本专题得到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支持，谨此致谢）